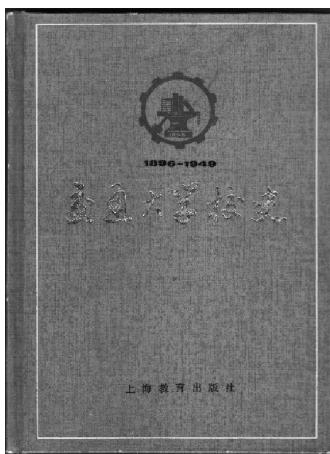


# 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三册校史(1896-1996)编纂出版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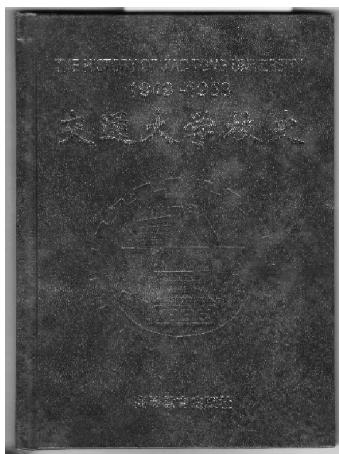
朱继洲

百年交大校史,现出版《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和《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从1982年开始启动第一册的编写,到2003年第三册出版发行,历时20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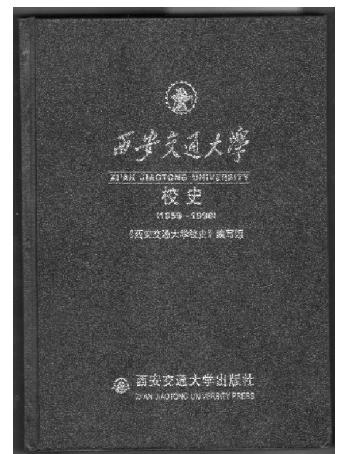
年。这三册校史一脉相承、是互相衔接的有机整体,它完整地反映、记载了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一百年的风雨历程,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迁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



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

## 一、《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

交大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就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交大的校

风是“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

——陆定一

1982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提议下，为了迎接交通大学建校90周年，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两校联合成立了《交通大学校史编写领导组》，成员有：史维祥、刘克、刘露茜、朱麟五、陈贻芳、赵富鑫、盛振邦、潘季（以姓氏笔画为序），并决定首先编写《交通大学（1896—1949）》，即解放前53年的校史，作为向交通大学校庆90周年的献礼。

在编写领导组的领导下，上海、西安两校共抽调不脱产编写人员8人，确定陈贻芳、刘露茜为主编，分别主持两校的编写工作。参加第一至第三章执笔的有刘露茜、周宗湘、张发荣、俞养吾、张巧豪，参加第四至第六章执笔的有陈贻芳、陈德崇、亦佳、刘菲、戴永明，书中照片由西安交通大学钱鹏和上海交通大学周密摄影、翻拍。

编写与出版《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是两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盼望已久的心愿，在他们的热情支持下，编写人员于1982年底拟定写作大纲开始工作，不辞劳苦奔赴北京、南京、上海、西安、重庆、昆明、苏州、无锡等地调查了解，采访校友数百人次，查阅了档案书刊几千卷，参阅了《在第二条战线上》等有关史料，于1984年初完成《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初稿，并听取了广大师生和校友的意见，作了相应修改。1984年8月又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审稿会议。参加审稿会的专家、教授和各位领导，经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修改稿的基本内容并补充了许多宝贵意见。经过再次修改后，1984年12月由两校党政领导审阅定稿。

1985年8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西安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陆定一同志欣然为《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作序。陆定一学长在《序》中写道：

“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志们，编写了《交通大学校史（1896—

1949）》，把学校从创办时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五十三年的历史，整理和记载下来，嘱我为之序。我曾在交大读书八年，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在那里形成的。毕业之后，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未能从事工业。我居然幸存下来，能亲自看到这本校史的出版，当然高兴。

“交通大学的性质，已经改变。全国解放之后，它是中国人民手里的理工科大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大学。现在这个时候，对1949年以前的校史作一回顾，有什么必要呢？

“我看很有必要。交通大学为什么会成立？是清朝统治者被迫成立的。1894年甲午之战，清军惨败，北洋军阀覆没。南洋公学才在1896年创办起来。创办的人，是清朝官僚中的洋务派。经过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三个统治时期，交通大学一直是‘工业救国’的旗帜。

“在这本校史所说的53年中，交通大学不是革命的学校。革命的思想，在学校里只能秘密传播。记得1926年暑假，姓凌的校长一下子开除了30多个同学的学籍，其中有功课极好，在班上经常考第一、第二名的高材生，只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就被开除。1927年，又有一批同学，因为看马克思主义的书，被逼写悔过书。

“但是，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和‘工业救国’的欺骗口号，终究是要失败的，终究要遭到进步的和爱国的师生的反对的。不仅学生中不断出现革命者，学校上层除了少数反动派以外，也出了陈石英等民主教授。唐文治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高风亮节，令人钦佩。全国解放之后，全校师生都拥护革命，学校也成为人民的学校。

“校史的价值和必要，还在于我国旧社会里，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设备、师资等各方面条件好的理工科大学，只有很少几个，交通大学算是凤毛麟角。我记得我在学校

时,华东有六所大学,其中五个是外国人办的。

“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同没有这样的大学,情况大不相同。中国人就能培养出自己的整套的办学干部,积累自己的整套的办学经验。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来办高等教育,不须从零开始,可以接收遗产,加以改造,立足于自力更生。”

“我们这一代,再加上第二代第三代,只有一个奋斗目标:要使中国富强。要富强,就必须建设。要建设又必须首先完成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之后,再搞‘一个阶级打倒另一阶级的革命’,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大破坏,一场浩劫。我们现在应该唾弃‘文化大革命’,全心全意搞社会主义建设。如果建设搞不成功,或者搞成了资本主义,那末,中国还是不能富强。”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建设的人才太少。记得1925年,那时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有了人才无用处,毕业就是失业。现在完全翻过来了,不仅理工科,而且文科,我们需要培养的干部,都以百万计。”

“交通大学栽培高级理工干部,是有成绩的。在机械电机、土木建筑、铁路运输、船舶及海洋工程、宇航工程、桥梁工程、材料工程、电讯技术、核物理、电脑等各个工业部门,都有许多交大历届校友在作出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贡献。交大校友受人尊敬,名誉很好,我非常高兴。如果我国要以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富强国家,不妨想想,我们还要多少人才,还要做多大的努力。”

“交大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为‘重视招生质量,坚持择优录取;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就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交大的校风是‘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以上都是交大同志们从几十年的辛勤劳动中总结出来的。它是教育

陆定一

1985.8.10 著于北京



1986年陆定一回母校参观西安交大校史展览馆

左起:校党委书记潘季,陆定一  
学长,校长史维祥

界、工业界可以借鉴的。我特地在这篇序言中把它记录下来。

“祝交大两校教职员同志们、同学们和历届校友们健康。谨以一个老校友的名义,向你们致亲切的问候!并将此书郑重地介绍给教育界的同志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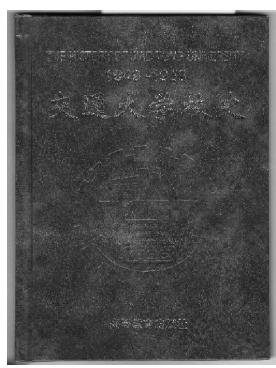
## 二、《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

交通大学是我国建校最早的两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和南洋大学)之一,交通大学的校史就是我们国家高等工程教育和工业发展的缩影;《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所涉及的建国开头十年,经历了很多大事,比如:迎接解放、接管、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三反五反运动、交通大学迁校、五八年“教育革命”、五九年“反右倾”等等,对这些历史事件,至今中央还没有正式的文件表态,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国家教委直属单位,出版这本书,等于代表中央表态了;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以来,已出版了几十万种书籍、教材,但是,出版一本大学的校史,这还是第一次。

——祖振铨

### (一)编写初稿

1989年,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的史维祥教授和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翁史烈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商定,在第一本《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



出版之后,两校应继续友好合作编写《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作为献给交通大学百年校庆纪念日的一份厚礼。时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校友祖振铨同志闻讯表示竭力支持,愿意承担出版任务并且参加编委工作。此后,历经《交通大

学(1949—1959)大事记》编写、大纲确定、调查采访、审稿会、审定会的召开,由于两校党政领导的支持,全体编写同志、两校编委和责任编辑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于1996年3月交通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正式问世。

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我校参加《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编委的有:潘季、庄礼庭、王文生、朱继洲、刘露茜,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刘露茜、陈潮江、司国安。受两校的聘请,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祖振铨同志参加编委。

《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的时间跨度虽然只有10年,在这期间,我们的共和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时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而从高等教育史来说,则经历了迎接解放、接管、建立党委、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三反五反、交通大学迁校、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分别独立建校等阶段。

在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组确定了全书的编写大纲和章节的划分,共分:迎接解放、院系调整、教学改革、迁校西安、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以及党的建设等六章,由上海交通大学负责前三章的编写,西安交通大学负责后三章的编写。前五章以编年史为主,而由于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是贯穿于全过程的各个阶段,大家认为,应该单独成为一章,在这一章中写出交通大学在解放后建党和思想政治工作光辉的一页,较为合适。

《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一批解放初期奉命从华东革大来接管交通大学的离休老同志,回忆起当时转移到文化战线工作的心情,接管工作的纷繁复杂,与知识分子干部共事,和做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体

会时,情绪激动、感情深沉,对党的团结、改造老知识分子政策的深远意义体会尤深。对于交通大学西迁问题,许多老干部和老教师都能从全局角度,历史地、辩证地阐述历时三年、牵动一万多师生及家属迁校西安的前前后后。

在很多干部和教师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迁校问题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各部和有关省市领导,以及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循循善诱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把当时(1957年)迁校问题确实是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如实地告诉群众,启发群众的自觉性,相信群众会考虑国家利益,能够处理好国家与个人关系,作出正确抉择的政治家气魄。也有不少同志坦率地分析迁校问题的利弊得失和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后期的反右斗争政治运动中,不应该把同意不同意迁校作为划分是否右派的标准,从而使得部分教师和学生受到了不应该的政治待遇。而最为令人感动的是编写人员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迁校过程中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不少老教授处理了在上海的房产,举家西迁;有很多中年教师(如今也都已年近古稀)辞别年迈的父母,有的还把幼子幼女托付给老人,轻装来到西安,全力投入老校新建的工作;而一大批年青教师,则义无反顾,追随着教研室集体、极少考虑个人的得失,来到西北安家落户,成为建设学校的中坚力量、学科建设的骨干,如今也都已年过花甲。遗憾的是由于校史的体裁和篇幅限制,没能按人仔细记述他们西迁的动人事迹。当然,也不能忘记,在如此庞大、复杂的迁校工程中,总务科、膳务科、幼儿园、花木组……等数百位后勤职工的辛勤劳动、细致周到的服务和巨大的努力;他们不仅要搬迁自己的小家庭,还要搬迁交通大学这个大家庭,如:上千名教职工及其家属的家具、行装,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文物档案的打包装箱、托运

接站,西安新校址的基本建设,绿化和水、电、煤等生活供应,乃至幼儿园、附小、附中的建设,无不浸透他们的心血。但是,在校史编纂中也只能对迁校的过程作大概的叙述,罗列各种数字来表明迁校过程的艰巨和复杂,没能为记录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劳动一生的老花工、老司机、老电工、老水工……的事迹留出一定的篇幅。

迁校时,交通大学全部档案都迁到了西安,这为编写《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提供最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解放初期护校、接管以及迁校时期与党建工作有关的历次党代会的决议等各种重要文件、计划、报表都能找到原始资料;在很多重要史实、材料的考证中,还得到了原国家教委办公厅的大力协助。很多重要史料在本书作为附件刊出。

## (二)二稿审稿会

1993年8月,《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二稿审稿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祖振铨,原国家教委二司司长刘一凡,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董文芳;我校党委副书记王文生,代校长庄礼庭,朱继洲,刘露茜,陈潮江,司国安;上海交通大学方面有:党委书记王宗光,副校长盛振邦,陈贻芳,陈德崇。会议就二稿的总体结构,各章节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祖振铨同志阐述了出版本书的意义,他说,交通大学是我国建校最早的两所



祖振铨

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和南洋大学)之一,交通大学的校史就是我们国家高等工程教育和工业发展的缩影;《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所涉及的建国开头的十年,经历了很多大事,比如:迎接解放、接管、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三反五反运动、交通大学的迁校、五八年“教育革命”、五九年的“反右倾”等等,对这些历史事件,至今中央还没有正式的文件表态,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国家教委的直属单位,出版这本书,等于代表中央表了态;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以来,已出版了几十万种书籍、教材,但是,出版一本大学的校史,这还是第一次。所以,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要精心编辑、精心装帧。

刘一凡同志20世纪50年代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秘书,改革开放后担任高教部二司司长。参与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调整与创建,也知晓交通大学迁校的由来、1957年反对迁校问题的产生,以及迁校问题的最终完满解决。

刘一凡同志在会前仔细审阅了二稿。会上,他着重分析了当时的世界紧张形势、时代背景,有力地说明中央、国务院作出迁校决定是国家整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1957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特别是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后,情况就起了变化,以至于在上海、西安两地会引起迁校问题的讨论。刘一凡同志的讲话,全面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拓展了看问题的角度、提升了认识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宗光同志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她在会上说:“从二稿上读到,解放初期,我们党为了接管好交通大学,建立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委派了那么多干部,对知识分子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读了交通大学西迁这一章,以及这次到西安交通大学实地看一看,切切实实感到迁校的不易,迁校问题涉及到左邻右舍、方方面面;很多教师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左起:司国安、陈潮江、陈德崇、盛振邦、庄礼庭、刘一凡、祖振铨、王宗光、王文生、陈贻芳、朱继洲、董文芳、刘露茜

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是他们,把交通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和优良的学风,带到了西安;是他们的高风亮节,才使得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西迁方案得以实现。交通大学在西安创业是十分不容易的,同样一件事,在上海能办成功的,在西安办要困难得多。”王宗光同志说:“由于交通大学要迁校西安,除了留下造船系成立上海造船学院外,还成立了南洋工学院,以为上海市培养工科人才之需,我就是1956年被南洋工学院录取的学生;1957年,按照迁校调整方案,成立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我就成了交通大学的学生。”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盛振邦195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留校工作,也参加了迁校的全过程。他在讨论中提出一项建议,第四章标题原定是:“迁校西安”,他建议改为:“从迁校西安到成立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刘露茜和陈贻芳原本是老朋友,20世纪50年代初,她们同在交通大学校刊编辑

室工作,1985—1990年,两校合作由她们主编了《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这一次,她们再度携手,承担起主编《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的重任。

就这样,在二稿的审定过程中,为了为交通大学树碑立传,两校编委回顾往事,相互切磋、相互补充,力求史料充实、分析有据,集中反映出两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基本观点,一切提法和结论都以有利于两校的发展为原则。

### (三)编辑定稿

1995年1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持的《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定稿会委托上海交通大学协办,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西安交通大学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王文生、朱继洲、刘露茜;上海交通大学的代表有:党委副书记蒋秀明,原党委副书记陆中庸,陈贻芳;高等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董文芳;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祖振铨同志因病,委托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教师管理办公室主任宗慎元同志(我校



左起:朱继洲、宗慎元夫人、刘露茜、宗慎元、王文生

校友)主持会议。

会议就1993年8月二稿审稿会后,双方编写人员写就的修改稿作最后的审定。宗慎元同志代表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祖振铨同志说明了会议的要求,他说“交通大学百年华诞将要到来,中央十分重视,十多万海内外校友尤为关心。祖振铨同志说,一定要出版好这本书,向交通大学百年校庆献一份厚礼,内容要请大家严格把关,编排要精心,封面要庄重大方,他还亲自选择了几种封面的彩样请责任编辑带到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

在会议的三天时间里,全体代表对书稿的全部内容逐章逐节、逐字逐句进行了讨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对某些疑点作了反复的斟酌,双方以大局为重,在大事上求同、在小事上存异。为了反映1959年独立建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两校的飞速发展和今后的展望,一致同意撷取重要的数据,写入后记。

#### (四)正式出版

1995年12月至1996年1月间,高等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董文芳同志,除了用电话经常与两位主编联系外,又带着书稿专程到西安、上海两地,作最后的订正、补充、协调工作。她虽然身患腿疾,为了确保《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能在1996年4月8日百年校庆前夕送到两校,送到几千位校友手中,仍认真、细致地坚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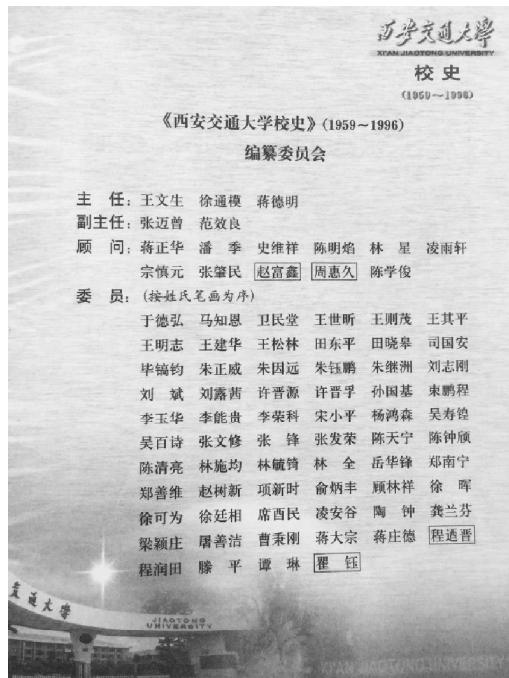
1996年3月底,我校收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发来的三千本《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后马上送到校庆办公室,分装送给校友的礼品袋中,望着这些还散发着油墨香味、装帧精美、色彩凝重的校史读本能够让校友给予母校更多的支持和关注。这本32开本的《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虽然只有21万字,却容纳了交通大学这所国内外有影响的高等学府解放初期

十年的历史变迁,记录的是我们党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初创阶段的经历,它必将激励后来者,为再铸和重创交通大学在21世纪的百年辉煌而奋斗。

### 三、《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

编辑好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不仅对学校自身“存史、资政、育人”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变迁的历史也能提供相当有价值的史料。

继《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编辑出版之后,2000年,学校又启动了《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的编纂工作,目的是为完整地反映、记录学校自身前100(1896—1996)年的历程,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编纂委员会由82人组成(见附图),王文生、徐通模、蒋德明任主任,张迈曾、范效良任

副主任。学校抽调了10位长期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的老同志组成编写组,成员有:范效良、凌安谷、朱钰鹏、朱继洲、刘露茜、郑善维、张发荣、张德通、司国安、冯蓉。当时,这些老同志中多数已经退休。

根据编纂委员会确定的指导思想和编写大纲,编写组的同志认真细致地查阅了大批档案资料,访问了许多相关人士,对有关专题进行了深入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初稿写出后,进行了多次集体审稿和修改、补充。《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征求意见稿)于2002年春完成。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党委宣传部、离退休处和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一大批离退休老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为提高书稿的质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书分五章,分别是:第一章《艰苦奋斗、又谱新章(1959—1966)》,第二章《十年“文革”、灾难深重(1966—1976)》;第三章《拨乱反正、整顿发展(1976—1985)》,第四章《改革开放、再创辉煌(1986—1996)》,第五章《党的建设与发展(1959—1996)》。

2002年元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校友蒋正华为《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年)》作了序。蒋正华副委员长在《序言》中说:“交通大学是我国创建

最早、办得最好的少数几所著名高校之一。长期以来坚持‘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优良办学传统;形成了‘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好校风,在办学中坚持‘严谨治学,博采众长,端揽名师’的方针,是国家造就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

交大不仅在国内声誉卓著,在国外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交大毕业生成绩优异,曾经获得免试直接进入一些世界名牌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信誉。

“从确定交大内迁西安,到调整为分设两地建设,最终实现了大部分系、专业和师生迁到西安。这些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决策,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进行的。它是我国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一个成功范例。迁校师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高尚情操,以及顾全大局,乐于牺牲,无私奉献,尽职尽业,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西安交大地处西北,办学条件比较艰苦。但艰苦也有好处,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太舒服不能锻炼培养青年,应该是锻炼经得风霜’,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对一所大学来说何尝不是如此。近半世纪以来,西安交大继承了老交大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扎根西北,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将学校越办越好,在交大历史上谱写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如今西安交大,已成为国家在西北地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教育、科研及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为西北大地上的一颗灿烂明珠。据我了解,已故的西安交大彭康校长在教育界深受尊重,他的讲话,如在贯彻‘高教六十条’、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意见,当时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西安交大的实力雄厚、基础扎实,教育部的不少学科建设、修订教



蒋正华校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育计划、教材建设等会议,经常放在西安交大召开;西安交大毕业生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工作勤恳踏实,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多年来保持在全国高校高就业率的最前列;1995年底,国家教委在西安交大进行本科教学优秀工作评估试点,西安交大被首家评为优秀;……这些都在我的心目中对西安交大留下美好的印象。交大在上海能够办好,到西北后仍能办得如此出色,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蕴含着诸如: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以及老一代迁校人和新一代西安交大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等丰富内涵。这些都是办好大学、特别是办好我国西部地区大学的重要保证。当今,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激烈竞争中,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潮流中,党和人民对西安交大寄予更大的期望,西安交大肩负着更加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完全相信,在建校150周年、迁校90周年时,西安交大必将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和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的突出贡献昭示于天下”。

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书末的附录中,收录了1996年4月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来的贺电,贺电原文如下:

西安交通大学:

值此你校隆重举行百年华诞暨迁校四十周年庆典之际,谨向全校师生员工及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交通大学是我国创建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在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优良的办学传统,桃李遍布华夏和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海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自五十年代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内迁并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以来,你校扎根西北,励精图治,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奋斗,把西安交通大学建设成为我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

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在教育、科研及管理等方面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起到了示范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为西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国家“七五”“八五”重点建设的高校,学校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成为西北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值此百年校庆之际,国家教委向你校全体教职员,特别是那些从上海迁来西安,四十年如一日为西安交大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

国家教委殷切希望你校在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的征途中,继续发扬交通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深入贯彻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为国家特别是西北地区和陕西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6年4月8日

作者

朱继洲 西安交通大学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退休教授